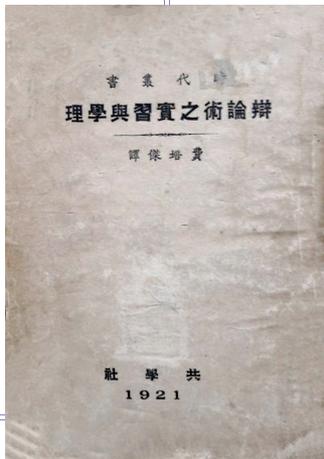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人民英烈——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》(1946)



《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》
(共學社,1921)

◀ (上接2版)

大集会上,他又会另一套,一登台便作狮子吼,配上他那飘拂的长髯,炯炯的眼神,不消几句话,就把气氛转变,群众情绪提高到极度,每一句话都打进人的心坎里去。虽然,在事先并无准备,甚至连讲的纲要内容都没有写下。

不仅政治演说,闻一多的学术演说同样很吸引人。1942年11月6日,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“伏羲的传说”。讲这样的题目也能吸引那么多听众,这才叫本事。朱自清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:“晚间听一多演讲,妙极,非常羡慕他,听众冒雨而来,挤满教室。”(见《朱自清文集》第10卷)晚年的闻一多,被朋友们看成是“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”(参见费孝通《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》);而有闻一多出席的场合,“听众总是五六千至二三万人,演讲时总是掌声不绝”(参见张友渔《斗争才能生存,退缩便是罪恶》)。仔细辨认闻一多演说照片,讲台上是有麦克风,可要让广场上数千乃至上万听众“掌声不断”,除了政治激情,还得有很好的演说技巧。就像吴晗《闻一多全集》跋说的,“他在晚年的若干次著名的讲演,都已收进了这集子里了。虽然已经变成了文字,那声调,那情态,无法记录下来”,我们只能根据回忆录等历史资料悬想与重构。

文字寿于金石,声音随风飘逝。关于晚清以降“演说”的提倡与普及,如1899年梁启超的“传播文明三利器”,1901年蔡元培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着意培养学生们的演说能力,1912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

长,当即通电各省都督,促其推行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教育,还有北京大学的“平民教育演讲团”和“北京大学雄辩会”,我在《有声的中国——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》(《文学评论》2007年第3期)等文中多有涉及。这里只想强调,演说可以训练的,也有相关课程及教材,这方面清华的做法最有成效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起家的清华,对于演说课程的重视,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者。学校里不但安排了演讲教练,配备了专门课本,还要求学生从中等科四年级起,必须练习演说三年。校园里,于是活跃着各种练习演说与辩论的学生社团,如英文方面的“文友会”“英语演说辩论会”“得而他社”,国语方面的“达辞社”“辞命研究会”“国语演说辩论会”等。此外,学校还设立了专门的演说辩论委员会,负责定期举办校内以及校级的演讲比赛(参见苏云峰《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:1911-1929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0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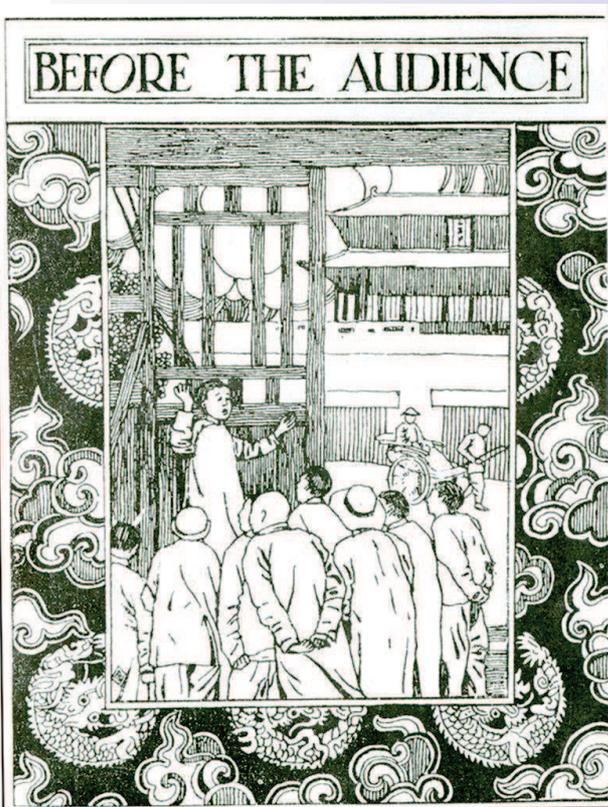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翻阅过的五六十种晚清以降的演说学著作中,学术上最有深度的,一是清华学生费培杰翻译的《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》(1921),一是北大教育系讲师张孟休编述的《听众心理学》(长沙:商务印书馆,1938)。后者多依据何林华(H. L. Hollingworth)的近著《The Psychology of the Audience》编译,主要讨论“一个演说者要征服他的听众”的五项任务,最后还提供了可操作的50条建议。前者的情况比较复杂,译者主要依据V. A. Ketcham 1914年版《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gumentation and Debate》,翻译中替换了若干例子,但译文力求忠实。该书由商务印书

馆刊行,列入“时代丛书”,封面署“共学社,1921”。共学社由梁启超发起,众多文化名流参与,编译欧美新书是其主要职责。这本书明显属于清华教材,出版时间署在封面上,我见到了1922、1923、1924、1925等不同年份的版本。初刊本上有清华学校校长金邦正的《序》:“学术思想之目的在求真理,而辩论术即是研求真理的种种方法之一。”而梁启超的《序》说得更复杂:印度及欧洲以雄辩为公共娱乐之一,而“吾国之文化,他事或不后人,而独于此何寂寂也?”任公先生从孔门言语一科说起,历代也有能言善道者,但即便魏晋清谈、宋明讲学,也都不尽如人意,究其原因:“其为政者,则惟有所谓密勿启沃,端拱成化,其于人之诵,漠不关心,更无论矣。呜呼!我国之民众的政术学术艺术,所以阅千年不一见,而长滞于腌昧肤薄之域者,岂不以是耶?岂不以是耶?”

这本被梁启超寄予厚望的《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》分上下编,第一编“辩论术之实习”包括以下章节——题目、题目分析、证据、编要略、编辩词、覆辩、演述辩词;第二编“辩论术之学理”包括归纳论证、演绎论证、因果论证、类比论证、谬误、驳论。作者在序言中特别说明,应该先实践后学理,以步步为营的训练为主。也正因此,全书最后附录“辩论的题目”,含社会类27则(印刷出版,应享绝对自由;国家应废除死刑;一夫多妻制应加禁止……)、政治

经济类28则(中国应采行联省自治制;中国应行普通选举;中国总统任期应加多一年……),以及教育类52则(全国国民学校教科书应由教育部规定一致;中学校应加授辩论术及实地练习;北京大学地址应移到圆明园;清华学校与其办成一个留美预备学校,不如办成一个完全大学……)。关键在于,以上题目都是可以辩论的,是非功过并非一目了然,须考虑正反两方面的观点。如此重技术而非立场的训练,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,这也是清华演说课业的最大特点。

闻一多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,在读期间使用的演说教材,是否包括这册191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,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但清华读书期间,闻一多重视演说课程,这点毫无疑问。翻阅闻黎明、侯菊坤编著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(增订版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2014),我们起码可以知道:1913年11月8日闻一多参与发起课余补



1921年闻一多担任《清华年刊》美术编辑期间创作的插画,图片上方是“BEFORE THE AUDIENCE”(面对听众)

习会,这学会分为图书、演说、练习三部;而演说部的要求是:“周有常会一次,以练习演说或辩论,期之终有比赛,优者奖之,以资鼓励。”1914年3月14日辛酉级与庚申级举行联合辩论会,题为“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读经”,闻一多任本级主辩。1916年5月26日清华学校中等科成立联合演说辩论团,闻一多为成员。1917年10月30日清华组织全校性演说辩论会,辛酉级选出七名选手,其中包括闻一多。

再看收入《闻一多全集》第12卷(湖北人民出版社,1993)的《仪老日记》,1919年1月4日:“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,不猛起直追,恐便落后。”1月6日:“作文演说果降列中等,此大耻奇辱也。”1月7日:“十一时后,在钟台下练‘CROSS OF GOLD’演说八遍。”1月8日:“夜偕德明习演说。”1月9日:“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。”1月10日:“演说略有进步,当益求精至。”1月11日:“练演说。”1月14日:“夜至凉亭,练演说三遍,祁寒不可禁,乃返。”1月15日:“温国文,习演说。”十二天日记中,竟有九次关于练习演说的记录,可见闻一多对此门功课的用心与用力。

从1912年入学,到1922年赴美,闻一多在清华园里度过了十年光阴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起家的清华,对于演说课程的重视,花那么多工夫训练学生的演说能力(从文辞、结构、语速、声调,到手势、眼神以及心理素质),是否值得,当时及后世均有争议。虽然闻一多在《恢复伦理演讲》(1921)中对学校将伦理演讲变成纯粹的学术演讲有所批评,但不妨碍他在演说课程上投入巨大精力。

二十多年后,作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,毅然决然走出安静的书斋,投身昆明的民主运动,在很多群众场合即席演讲,其得心应手、挥洒自如,显然与早年清华打下的底子密不可分。诗人杜运燮在《时代的创伤》(《萌芽》第1卷2期,1946年8月)中称: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说。他具有诗人的表现情感与思想的适当美丽辞句,革命家的热情,演说家所需要的宏亮的好嗓子,而且他对朋众心理亦有深切的认识,了解他的听众,所以他的有力的警句便不断地从他那围有山羊胡须的嘴里流出来,朋众不断地报以最热烈的掌声。那是非常动人的场面,所有听众莫不以得能参加那感情泛滥的狂潮为光荣。

(下转4版) ▶